

◆迈向 21 世纪的语言学◆

主编 吴国华

副主编 王铭玉

社会语言学

赵蓉晖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社会语言学 赵蓉晖编 鄞—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圆园园源

摇摇 (迈向 圆园世纪的语言学 赵国华主编)
圆园园源 猿月 猿苑- 愿园 缘- 源苑- 猿

I 鄞社... 摇 II 鄞赵... 摇 III 鄞社会语言学-文集 摇
IV 鄞园- 缘袁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源)第 员圆圆圆 号

摇摇摇

摇摇摇摇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摇摇摇摇摇(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摇邮编：圆园园源

电摇摇话：圆园园- 远新圆圆圆圆(总机) 远新圆园圆圆(发行部)

电子邮箱：远新圆圆圆@远新圆圆圆.com.cn

网摇摇址：远新圆圆圆.com.cn 远新圆圆圆.com.cn 远新圆圆圆.com.cn

责任编辑：张逸岗

印摇摇刷：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印刷厂

经摇摇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摇摇本：摇摇 伊摇摇页 圆园园张 摇摇字 摇摇千

版摇摇次：圆园园源年 圆月 第圆版 圆园园源年 圆月 第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摇摇册

书摇摇号：圆园园源- 猿月 猿苑- 愿园 缘- 源苑- 猿

定摇摇价：圆园园元

摇摇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摇序

摇摇我在“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语研究》~~四四年~~年第猿期)一文的附注中曾有这么一段话:“感谢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上外出版社和北外出版社的竞争,近两年它们分别引进出版了大批语言和文学原版书,受到广大导师和研究生的欢迎。”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解读这两家权威出版社互动的深远意义,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外语出版界的反映,这是中国参加 宰裁酌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标志,不一而足。我们教师是讲实际的,有书看比没有书看好,有许多许多好书比一门课只念一本书好。但是,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事物总是两方面的: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不能光抓引进一面。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想了解国内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学得深入,学以致用。何况我们也应立足于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拿出自己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所幸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教师们早看到了这一点,近几年来立项研究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动向和成果,这套《迈向 圆世纪的语言学》系列丛书便是他们深邃远见所凝聚的心血。

语言学的领域广,分支多,要在短时间内摸透所有的学科,未免强人所难,不合实际。幸好本书的编者不愧是有素养的军人,能集中兵力,围攻主要战略目标,这主要战略目标便是当代语言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学科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前沿学科。在本丛书八个分册中:《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当家学科,当在首列;语言作为人们交际的符号之一,

而且是最主要的符号工具,说明《符号语言学》的重要性;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和做事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从语言本身和语境讨论意义的表述和理解;语言是人在所生活的社团中交际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国情学》把我们引入探讨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和民族文化、习俗等关系,以及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最后,上世纪中叶启动的《计算语言学》必然在新世纪得到飞速的发展,它在多媒体教学、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作用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

1987年,当我和一些老师合作编写《语言学教程》一书时,王宗炎先生和许国璋先生在“第一版序”中曾给过一针见血的但又是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不妨转录如下:

1. 引进的理论,能用汉语说得清,讲得懂;能用汉语的例证加以测验。

2. 凡有可能,不妨采用现场工作法。我国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测试学研究者已做出榜样,值得学习。

3. 凡在汉语诸范畴中验证外国某一理论,其有解释力者肯定之,其解释力太弱或不具解释力者指出之,其主观臆测者直言之,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

4. 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白价值所在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对理论有矢志不渝的精神,理解深,教得熟,力求贯通、比较、自创。

5. 汉语研究者中的前辈已经做出的自创,外语系出身的研究者应该认真读,读懂,直至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

十五年过去了,上述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呢?我认为有的。本丛书所遴选的论文可以佐证。这些论文印下了同行们前进的足迹。有不少论文对国外的理论比过去说得更清楚,有不少论文注重现场调查,有不少论文选用汉语例证,有不少论文试图提出自创的理论,更令人高兴的是有许多论文出自汉语界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如果考虑到本丛书作者群中有各个语种的研究

者,也有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在我们眼前顿时涌现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语言学大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自当会有更蓬勃的发展!

还应指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的工作不仅仅是遴选论文,而是为每一分册整理了该学科的概观、发展和趋势的引论,并对每篇文章进行客观分析与评论。这一编辑思想保证了论文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是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师资力量和水平的检阅。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胡壮麟

一九九〇年八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

前 摇 言

摇摇近几十年来,国外语言学研究的进展迅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挖掘学科成果,提炼学术思想,形成系列研究,巩固学科发展,弘扬民族精神,是编撰本丛书的主要目的。

本丛书以八大语言学前沿学科为线索,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各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总结,对我国语言学家的重要思想观点进行评析,对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做出展望。丛书共有八个分册,分别为《普通语言学》、《符号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国情学》。各部分的主体结构如下:(员)总序;(圆)引论(包括学科概观、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趋势等内容);(猿)20 世纪(主要是 1949 年以后)我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源)评析(对每篇学术文章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缘)主要文献索引。

应该说,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并不算少,但各自为政、零散分布是主要问题。在进入 20 世纪之际,系统研究、合力共现,将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我国高校的语言理论教学对国内外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的追踪和发展往往重视不够,重复性劳动普遍存在,造成严重的人才和资源上的浪费。本丛书将为展示前沿科研成果、促进语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备的案头参考。

鉴于编者涉猎面有限,在遴选论文的过程中,难免会挂一漏万,“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对每篇论文的“评析”也会有不够准

确、客观之处 ;另外 ,本丛书所收录的论文基本上选自国内的一些学术期刊 ,为便于读者查阅原作 ,编者未对论文的体例作大的调整和统一 ,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式 ,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 ,编者在选定论文之后 ,向每篇论文作者发去了联系函 ,并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 ,我代表课题组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遗憾的是 ,个别原作者由于地址变更等原因 ,至今未能联系上。在此 ,敬请有关论文作者或其亲朋好友见书后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我们或出版社 ,以便取得联系。

吴国华

二〇〇四年 元月

目 录

引论	赵蓉晖
社会语言学述评	祝畹瑾
社会语言学 源年	杨永林
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综述	顾曰国
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	刘援朝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九五”回顾和“十五” 摇展望	戴昭铭
论民族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王远新
语言的社会性与语言变异	吴国华
试论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观及其方法论	丁信善
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	赵蓉晖
从变异现象看语言演变的机制	黄宜思
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	束定芳
语言禁忌现象的立体透视	张向阳
语言调节与语言变异	施春宏
语言的生态环境	张公瑾
双语和双语研究	瞿霍堂
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	冯志伟
语言制度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价值	姚亚平

论语言融合和社团方言	伍铁平	摇猿愿		
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石定栩	摇猿源		
自然语言语码转换研究的若干方面	李摇刚	摇猿员		
语码转换与称呼语的标记作用	李经纬	摇猿苑		
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影响——语言接触引起的 摇语言变化	石定栩	摇朱志瑜	摇猿苑	
新加坡华社双语调查——变项规则分析法在宏观社会 摇语言学中的应用	徐大明	摇猿远		
再论语言生活调查	陈章太	摇猿苑		
国内外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概述	苏金智	摇猿怨		
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摇	高一虹	摇苏新春	摇周摇雷	摇猿源
面向 圆世纪汉语方言研究	李树俨	摇猿园		
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述评	刘正光	摇猿缘		
语域理论简介	张德禄	摇猿园		
约翰·甘柏兹的学术思想	徐大明	摇猿源		
主要文献索引		摇猿苑		

引 摇 论

赵蓉晖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1980年)尽管语言学家们对社会语言学的定义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表述,但他们都一致认为,社会语言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其得以产生和运用的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和考察。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确立至今只有不到 40 年的历史,但却因其独特的学科性质和极强的发展能力而备受关注。目前,社会语言学已经和句法学、音系学、语义学等一起,成为许多大学语言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此外,它也已经由最初的巩固自我地位的初始阶段走向了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的中、高级阶段了。

一、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般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确立以 1959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为标志。但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它的出现也是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没有就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关系所进行的长期思考,如果没有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方言学等学科提供的理论与知识作基础,我们就可能看到今天巍然耸立的社会语言学大厦。因此,对历史的回顾和

总结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掌握这一学科的内容与实质。

结合社会因素考察语言问题的思想在中外语言学史上早就出现过,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名实之争”和古希腊哲学家的“词物之争”都是针对名实关系和词的社会规范性而进行的。荀子在《正名》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说明古人对语言的社会约定性质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直到18世纪,语言的社会性质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戚雨村,1998:190)有关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论述开始出现在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著作中。

德国学者洪堡特(1774-1845)关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对社会语言学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实际上,语言总是只在社会中发展。”(1980:100)波兰学者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29-1907)在《对语言学和语言的几点总的看法》中不仅说明了人类言语活动的社会性质,而且提出了有关语言社会功能多样化的见解,认为应当把一切社会等级的口头语言(言语)和不同年龄(儿童、成人、老人等)及各种身份的人的语言都列入语言学研究范畴。瑞士著名学者索绪尔(1871-1942)则指出,语言是一套建立在社会约定基础上的符号系统,而“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赵蓉晖,1999)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房德里耶斯(1863-1937)在《语言——历史的语言学引论》中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结合社会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依赖于社会集团的存在。此外,房德里耶斯还分析了语言间的关系、共通语言的形成以及它和宗教语言、隐语等“特殊语言”的关系。丹麦学者叶斯帕森(1860-1943)在其名著《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中研究了语言的社会性质、语言发展的社会原因、语言的传习过程、语言的相互影响(包括皮钦语和克里奥语问题)、女性的语言等问题。(戚雨村,1998:190-191)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语言建设工作促使语言学家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语言学”(主要倡导者是波利万诺夫,Д.Поливанов),这门学科的任务在于描写作为社会历史事实的语言、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定语言政策,较偏重于宏观方面的内容。后来由马尔(М.В.Варшавский)提出的“语言新学说”在阐明语言社会性的同时,认为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这种观点固然值得商榷,但却把语言和社会这两者的紧密联系特别地突出出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英、美两国,语言学家和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一起,对亚、非、拉美等地的语言状况和本国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了一系列社会与语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现象,联系社会因素考察语言问题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语言学家甘柏兹(G. B. B. G. G.)系统论述了社会分层与语言差异的关系,并在《言语共同体》一文中首次用“语库”(Dialectal Continuum)这一概念来表示一个言语共同体使用的多种语言变体(增补)。1959年,弗格森(F. R. Ferguson)和甘柏兹共同编写的《南亚语言差异:区域、社会与功能变异调查》一书对当时的一些语言学家只凭语言结构的相似和互相的可理解性来划分“语言”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认为一种语言是由多种变体组成的,语言的划分“必须符合某些社会条件(如使用标准语、说话者对该言语共同体具有从属感)以及某些必要条件(如语言内部的变体结构相似,与语言外部的变体结构相异)”。(祝畹瑾,1985)在英国,社会学家兼心理学家伯恩斯坦(B. Bernstein)提出了涉及社会阶层与语言使用关系的假说。他将不同阶级成员所使用的语言区分为有限代码(Limited Code)和复杂代码(Elaborated Code),并指出,不同的代码与说话者不同的心理、社会经验、家庭环境和阶级地位有关。伯恩斯坦的理论后来被曲解为缺陷论(Deficit Theory),和当时流行甚广的不足论(Deficiency Theory)

澳、英、美等国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激发了人们关注“语言与社会”问题的热情,从客观上成为促使社会语言学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杨永林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欧美出现的伦敦功能学派和北美人类语言学派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永林,1995)前者以马林诺夫斯基(1871—1926)和弗斯(1898—1963)为代表,在语境学说的建立方面功不可没;后者以博厄斯(1874—1955)与萨丕尔(1889—1939)为代表,在把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的观点引入语言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就是由北美人类学派提出的。许国璋先生也认为,作为功能主义语言学重要人物之一的韩礼德(1917—1985)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祝晓瑾,1991:5)

综合地看,社会语言学的诞生是由多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是社会历史的需要激发了语言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变革频繁,政治形势多变,社会关系复杂化。在当时,新兴国家的建立、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和教育的实施等实际问题的解决大多涉及到具体的语言政策问题。作为民族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语言,因此受到了来自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关注,它的社会性、文化性、民族性等以往被忽视的特性因而得以逐步显现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语言研究的物质条件大大改观,社会科学普遍采用的调查法和统计法使人们更易于通过事物总体的数量关系来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美国学者拉波夫(1926—)正是使用了在当时颇为先进的录音设备,同时借助于调查法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1965),从而开创了对语言变异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因此可以说,新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

基础。

最后,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呼唤着变革的出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被社会语言学打破了。众所周知,自从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对立之后,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就在他所强调的领域进行着为语言而语言的结构主义研究,内部语言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跟语言主体(指“人”)的社会、心理、实际运用等有关因素几乎被完全排斥在语言学之外,而到了乔姆斯基(1929—)时代,语言的使用者和使用环境已经完全被理想化了。这种语言观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逐渐暴露了出来,并且终于导致了一些针对性理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社会语言学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吕叔湘先生给社会语言学以高度评价,把它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列,称之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吕叔湘,1984)

在各种条件均已成熟的前提下,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水到渠成。1967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明确讨论了该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研究领域等问题。同年,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了另一次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讨论会。因此,人们通常把1967年作为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之年。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从此步入了正轨,不仅出版发行了两本专业学术杂志(由费什曼(1926—)主编的《国际社会语言学杂志》(1968)和由海姆斯(1927—)主编的《社会中的语言》(1970)),而且成为许多大学语言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就连当初把社会语言学研究比喻为采集蝴蝶标本的工作,认为其重要性无法同理论语言学相提并论的乔姆斯基,最后也改变了看法,声称从不怀疑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语言科学中的合法地位。(许国璋,1984;杨永林,1984)当代社会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在法律、广告、诊断、教育等领域内广泛开展,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学科性质

二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由于语言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元理论,因此对决定语言学发展的哲学和文化体系的认识是了解学科本质所必需的。马尔科娃(М.А. Маркова)在《范式、思想及语言》(Парадигмы, идеи и язык)一书中概括出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两大哲学—文化体系:笛卡儿体系(Декартов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和黑格尔体系(Гегелев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这两大理论体系同样可以看作是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我们可以此为线索探寻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根基。

笛卡儿体系认为,知识是通过以演算程序为形式的一系列演绎步骤获得的。该体系的理论的目的在于确定什么是确凿可信的,因此导致这一体系对不变的普遍特征的不懈追求。笛卡儿体系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二元论,即将思想(意识、精神)与躯体(无意识、物质)截然分开,并认为内在世界在认识论方面应先于外部世界。因此,这一体系不考虑思维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由于他们认为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是由内在的预设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功能被看作是与历史发展过程无关的状态。与此相反,黑格尔体系主张一元化的方法,认为思想与躯体、思维与介体为了存在与发展而相互依存,也正是通过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才使意识得以发展。主体与客体紧密联系且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获得是反射过程的自身循环,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次经验都改变了我们的意识。黑格尔体系还认为,结构和功能都具有先天的基础,但这种基础仅仅是在特定的交互环境中产生并发生变化的一种潜势。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体系以历史发展过程为取向,以存在的辩证本质取代了纯粹的形式化理论。它的理论目的在于探索存在于具体事件中的普遍规律。

显而易见,上述两大体系对世界的认识持两种相反的观点。笛卡儿体系关注的是不被人类行为影响的、永恒的、客观的、分立

的、抽象的普遍现象；黑格尔体系注意的则是非离散的、变化的、相对的、依存于人类行为的具体现象。这两大体系的思想反映在语言学方面，就使语言学内部形成了两大阵营，不少学者用形式主义（索绪尔语）和功能主义（索绪尔语）来区分它们。总的看来，“社会语言学是一种以语言使用者为中心的语言学”，“将社会语言学放到黑格尔哲学体系和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来讨论是恰当的”。（陈建平 1994）

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

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地位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得到确立，但是由于它所包括的纷繁的研究内容和复杂的学科交叉性质，导致人们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多样化的认识。法国学者马尔西雷斯（1968）甚至说：“社会语言学的轮廓模糊不清，它那多种多样的分支学科混杂在一起”，以至于“乐观主义者把它称为一门学科，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学派而已”。（1968）我们参照中国学者郭熙（1988）的观点，把目前人们对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解归结为以下几种学说。

语言本体说

美国学者拉波夫（1968）始终认为，社会语言学就是语言学本身，是对语言结构的一般研究。他一直没有完全接受“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认为它的出现意味着可以有一种不从社会的角度探究语言的语言学。拉波夫于“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一文中指出，他的研究重点包括语言规则的形式、语言规则的体系、不同规则系统的共存以及这些规则与系统的演进，这些研究通常被认为属于普通语言学的领域。他还强调指出：“倘若没有与脱离社会环境的语言研究相对照的需要，我宁愿说这（指其本人的研究）就是语言学。”（1968）拉波夫对社会语言学的限定是“在言语集团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论及的领域包括通常所称的‘普通语言学’，即音系学、词法学、句法学和语义学”。（丁信善 1988）

摇摆分支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语言学就是“社会语言学”。例如英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匀德森)说过:“我们把社会语言学界定为联系社会对语言所进行的研究。”(匀德森)针对分别偏重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两个研究方向他又说道:“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着重点不同,它取决于研究者对语言还是社会感兴趣,同时取决于他专长于分析语言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二者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区域,因而对二者做出比目前更为明确的区分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匀德森)

摇摆两属说

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德舍里耶夫(Дешериев)认为,社会语言学不仅仅属于语言科学的范围,由于它诞生于其他学科之间,因此是一门学科际的学科。在语言学内部,他主张区分语言学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结构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把它们作为语言科学的组成部分,这二者研究的是同一对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德舍里耶夫担心,一旦人们企图划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便破坏了语言学科内部上述两个部分的有机结合。

语用说

美国学者兹威斯基本提出了最狭义的社会语言学概念。他认为,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什么”。其中是社会语言学的语言部分,包括了使用语言的人,是关于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人与社会情景结合起来就是社会因素。社会语言学一直想回答的就是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原则。这种研究与语用学颇为类似。这样的理解使得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和复杂起来。